

鲁迅回忆录



散篇

(下册)

鲁迅博物馆
鲁迅研究室 选编
《鲁迅研究月刊》
北京出版社

鲁迅回忆录

散篇

(下册)

鲁迅博物馆
鲁迅研究室 选编
《鲁迅研究月刊》

北京出版社

追记鲁迅先生

宋庆龄

鲁迅和杨杏佛曾于一九一一年同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职务，但直到一九二七年同时加入中国济难会以后，两人才有机会相识。一九三二年夏杨任中央研究院秘书时，请鲁迅先生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年秋季鲁迅、蔡元培和我都被选为该同盟执行委员。当时白色恐怖很厉害。鲁迅住在上海虹口区，处境困难，因为那里有很多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和警察监视他。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鲁迅、蔡元培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以及如何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学生们，并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这个同盟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一九三三年六月杨杏佛被暗杀后，同盟即停止活动。

当时林语堂是同盟的会员，他要求同盟停止工作，说否则同盟的会员都将遭到暗杀。

英国文豪萧伯纳，有一次来我家午餐时，同盟的几位会员都在座。他早已受到英政府的警告，因而他在我处很少发言。当时林语堂和他滔滔不绝地谈话，致使鲁迅等没有机会同萧伯纳谈话。

我最后一次见到鲁迅是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在那里从南京

来的苏联大使勃加莫洛夫设宴请客，鲁迅亦在座。席散后放映苏联电影《夏伯阳》。电影完了后，勃加莫洛夫面询鲁迅对影片有何看法，当然他很希望鲁迅高度赞扬这部影片，但鲁迅回答说：“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

嗣后，鲁迅因患肺结核而不能再出门了。苏联政府请他到克里米亚的疗养院去休养，但他婉言拒绝了。一天早晨，我忽然接到冯雪峰的电话，在鲁迅家我曾见过冯一面。当我这次去鲁迅家里，冯同我走进卧房，只见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躺在床上溘然长逝了。他夫人许广平正在床边哭泣。

冯雪峰对我说，他不知怎样料理这个丧事，并且说如果他出面就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当时我想到一位律师，他就是年迈的沈钧儒。我立即到沈的律师办事处，要求他帮助向虹桥公墓买一块墓地。沈一口答应，并马上去办理。

当时白色恐怖厉害，在鲁迅的追悼会上发言要冒生命危险，我在会上致了悼词，可能有人记录下来了。记得当时在法新社工作的胡愈之亦在场。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日

（原载1977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

宋庆龄（1893—1981），广东文昌人。孙中山夫人。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一九三二年与蔡元培、杨杏佛等筹建并领导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曾正式加入同盟并积极参加同盟的活动。一九三三年，萧伯纳来华时鲁迅应邀在她的寓所与萧会晤。同年五月为抗议德国法西斯暴行，她与鲁迅、杨杏佛等人同往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一九三六年鲁迅病重时，她曾致信鲁迅，力劝其住院治疗。鲁迅逝世后，她亲临葬礼，并发表演讲。

记鲁迅先生选苏联版画

赵家璧

这是距今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一九三六年二月间，在上海青年会九楼的东厅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向上海人民第一次公开展览了约近二百幅的苏联版画原作。这个展览会震动了整个中国文化界，许多反动的保守的报刊也不得不刊载了消息和特写，申报也请鲁迅先生写了文章。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八仙桥的大厦里去，其中最多的是爱好文学艺术的青年、学生，几乎所有的木刻家和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都去观摩了。对苏联的介绍文字，这以前也有发表或出版，但是数量既少，还要经审查官的涂改删削；苏联的艺术作品，只有在进步文艺刊物里偶尔当做插图登载一二幅，也远不能满足对苏联要有一个比较正确认识的读者的要求。这回有整批的直接从莫斯科运来的原作艺术作品送到每个人的眼前，使大家都有了直接欣赏的机会。在那里既可以看到十月革命的英雄人物和斗争史迹，又可以看到集体农庄、工人住宅、飞机、水闸、拖拉机、托儿所。苏联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以及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几个五年计划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通过艺术家的刀和笔，第一次在观众面前比较全面完整地展开了一幅现实的幸福的远景。被这些版画深深感染了的参观者，对发生在北国的许多奇迹，不胜向往羡慕之情，而结合

了当时在国内的黑暗、混乱、贫穷的政治情况，又都不免自问：我们的祖国到什么时候才能和图画中的苏联一样呢？

展览会对当时社会所引起的大震动，使许多朋友都认为有把展览品出版一本画集的必要；这样既可扩大展览会的影响，对中国的版画作者，也可以留下一册很好的作业范本；而如能约请鲁迅先生担任编选写序的工作，一定能起更大的宣传作用。朋友们又认为这样一本画册，我在那里担任编辑工作的良友图书公司是比较合适的出版者。于是我得到出版社经理的同意后，很快和展览会的主持机关接上了关系。苏联领事馆的秘书萨拉托夫先生，在展览会闭幕后的几天里，就通知我到外白渡桥脚下的苏联领事馆里去，把一大箱的原画交给我了。

鲁迅先生这一阵身体听说不很好，我想这一件工作，也许是他高兴做的；就写了封信去征求他的意见，我建议可以把原画送到他常去的内山书店，让他从容挑选。他在四月二日复了我一封信，信中说：

苏联画展，曾去一览，大略尚能记忆，水彩画最平常，酌印数幅已足够。但铜刻，石刻，胶刻（Lino-cut），Monotype 各种，中国介绍尚少，似应加印若干幅，而 Monotype 至少做一幅三色版。大幅之胶刻极佳，尤不可不印。

至于木刻，最好是多与留存，因为小幅者多，倘书本较大，每页至少可容两幅也。

我可以不写序文了，《申报》上曾载一文，即可转载，此外亦无新意可说。展览会目录上有一篇说明，不著撰人，简而得要，惜郭曼教授译文颇费解，我以为先生可由英文另译，置之卷头，作品排列次序，即可以此文为据。

阅览木刻，书店中人多地窄，殊不便。下星期当赴公

司面谈，大约总在下午二点钟左右，日期未能定，届时当先用电话一问耳。

四月七日上午接到了电话，当日下午一点多钟鲁迅先生就到良友图书公司的编辑部来了。我的编辑室在三楼，通过狭窄的三层铁扶梯，才是一间不到十尺见方的斗室，放了两张写字台，一张长沙发，一个书橱，已转不过身来。向西开的窗子，虽然挂了一张竹帘，一到下午三点钟，太阳就直晒进半屋。借来的一木箱原画，就安放在沙发底下。鲁迅先生走上三层扶梯，显得有些气喘，但是没有休息一会，立刻要求把原画拿出来让他看。一大堆原画就从木箱中移出摊在沙发上，他坐在面前的椅子上，一张张翻阅着，仔细地推敲、研究，把选用的放在一边，不用的放在另一边。事实上，他还借着这个机会又一次的欣赏苏联版画大师们的作品。他说，他虽曾去青年会参观，也是走马看花，印象不深；现在倒可以坐着再一次地浏览一遍了。他一方面钦佩原作技术的高超，又担忧复制后多少要打一个很大的折扣。这天选画时间，最初估计不过一、二小时，但是他一直看到下午五点钟才完毕。鲁迅先生对每幅版画都细细的玩味，先放近前看，然后又放远处看。有时脸上浮起一阵满意的笑容；有时凝神静思，长久地默不作声；有时也指出这幅画的优缺点，谦逊地征求旁人的意见。这天下午，他像完全进入了苏联版画家所创造的精神世界中，忘记了斗室里逐渐增加的闷热气氛，对旁人要他略作休息的要求，也毫不考虑。我们站在他身旁背后，屏息静观，有时帮他搬动画幅；除了纸张的窸窣声外，大家好像连呼吸都停止了。等他把约近二百幅原画全部看完时，时间已近下班，斗室中满屋太阳。他站起来伸了一下腰，又抽支香烟时，频频地用手帕拭去他额上的汗水；还不时地咳嗽。我才开始发觉今天不应当把老人家请到

出版社来，而是应当不按照他的嘱咐，直接送到他家里去让他选画的。

他抽完了一根烟，又接着在选出的一堆版画中，指定那几幅要做彩色版，那几幅可以缩小后放在一面上，而能按原画大小印的，要求尽量用原寸。对克拉甫兼珂的两幅邮票，特别的要我们注意。出版时，每幅画下都要求详细注明原画的尺寸。他说，过去印画，大家对这一点素不注意，实在是对原作者的不敬行为。根据四月二日的来信，他本来不预备重写序文的，选画后他又有了不少“新意”，因此当我要求他为这个画集可否考虑另写一篇序文时，他就毫不思索的答应了。我们看他精神已很疲乏，就要他多坐一会再走，但是他把重要的事情交代清楚后，一起身就告辞了。我陪他走下铁扶梯，送到大门口，他的气色比来时苍白得多，我也不敢向他再提有关健康的话。我回到三楼编辑室，看到分摊成数堆的画稿，地下丢着的许多香烟头，想到这位老人家今天如此热诚地花了整个下午来选画，不知会不会影响他的身体；而他对介绍苏联文化工作的重视，使每个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深深地受到感动。

选画工作完成后，在印制问题上，鲁迅先生又为这本画集出了很多主意。萨拉托夫先生把原画借给我们时，他对我们能把展览品出版表示热诚的欢迎，对鲁迅先生能选画作序更是高兴，作者的版权稿酬也慷慨地放弃了。他唯一的要求是画集要印得好些，要保持较高的印刷质量；售价不宜太高，要让一般读者都有力量购买。当时我们想按照《引玉集》的印刷方法送到日本去印。我把这意见去信征求了鲁迅先生的意见，他在四月八日的复信上说：

印《引玉集》的社名和地址，录奉……就是印《引玉集》那样的大小，二百页左右，成本总

要将近四元，所以“价廉物美”，在实际上是办不到的，除非出版者是慈善家，或者是一个傻子。

回寓后看到了最近的《美术生活》，内有这回展览的木刻四幅，觉得也还不坏，颇细的线，并不模胡，如果用这种版印，我想，每本是可以不到二元的。

我的意思，是以为不如先生拿这《美术生活》去和那秘书商量一下，说明中国的最好的印刷，只能如此，而定价确可较廉，否则，学生们就买不起了。于是取一最后的决定，这似乎比较的妥当。

版画没有送到日本去印制，上海制的铜锌版，还能令人满意。当我把制好的一部分版样送鲁迅先生看时，他四月十七日复信说：“所做的铜锌板，成绩并不坏。不过印起来，总还要比样张差一点，而且和印工的手段，大有关系：这一点是必须注意的。”此后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但是鲁迅先生的序文还没有来。五月上旬就听说鲁迅先生病了，我回想起选画那天的情况，心中颇感不安。五月二十三日写了封信去，第二天就得到了下面的复信：

发热已近十日，不能外出；今日医生始调查热型，那么，可见连什么病也还未能断定。何时能好，此刻更无从说起了。

《版画》如不久印成，那么，在做序之前，只好送给书店，再转给我看一看。假如那时我还能写字，序也还是做的。

不久，画集正文全部印成，我遵照他前信的嘱咐，送了一份毛样给他。知道他病没有好，附去的信上，也不再向他催索

序文。但是六月二十四日却接到了许广平先生的一封信，里面附了一篇鲁迅先生的新序。序文的最后两节这样说：

右一篇，是本年二月间，苏联版画展览会在上海开会的时候，我写来登在《申报》上面的。这展览会对于中国给了不少的益处；我以为因此由幻想而入于脚踏实地的写实主义的大约会有许多人。良友图书公司要印一本画集，我听了非常高兴，所以当赵家璧先生希望我参加选择和写作序文的时候，我都毫不思索地答应了：这是我所愿意做，也应该做的。

参加选择绘画，尤其是版画，我是践了夙诺的，但后来却生了病，缠绵月余，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写序之期早到，我却还连拿一张纸的力量也没有。停印等我，势所不能，只好仍取旧文，印在前面，聊以塞责。不过我自信其中之所说也还可以略供参考，要请读者见恕的是我竟偏在这时候生病，不能写出一点新的东西来。

这一个月来，每天发热，发热中也有时记起了版画。我觉得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潇洒，飘逸，伶俐，玲珑的。他们个个如广大的黑土的化身，有时简直显得笨重，自十月革命以后，开山的大师就忍饥，斗寒，以一个廓大镜和几把刀，不屈不挠的开拓了这一部门的艺术。这回虽然已是复制了，但大略尚存，我们可以看见，有那一幅不坚实，不恳切，或者是有取巧，弄乖的意思的呢？

.....

这几段新序是鲁迅先生在病中口述后由许广平先生记下的。六月六日起一直到六月底止，鲁迅先生病势沉重，《鲁迅日记》里这二十五天都留了空白。鲁迅先生于六月三十日追记

六月六日以后的病情说“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在连每日必写的日记都停笔的病中，他仍念念不忘于这批苏联版画，而把序文口授后，赶在出书前寄来，这一种伟大的忘我的精神，岂止为了这本小小画册的出版而已。他所关心的是通过这些苏联艺术大师的版画作品，将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起到更大的启发和鼓舞的作用；让更多的人从中看到社会主义苏联的真面目，更多的艺术家能从幻想而踏上现实主义的道路。这一颗爱真理、爱艺术、爱苏联的伟大的心灵，纵使暂时受到疾病的折磨，还是像太阳一样发放着光彩，照暖着每个读者的心。

七月四日《苏联版画集》出版了，我把装订好送来的最先五册样书送了去，六日又送去了十八册。七日收到了他的复信。

六日信及《板画集》十八本，今天同时收到，谢谢。在中国现在的出版界情形之下，我以为印刷，装订，都要算优秀的。但书面金碧辉煌，总不脱“良友式”。不过这也不坏。至于定价，却算低廉，但尚非艺术学徒购买力之所能企及，如果能够多销，那是我的推断错误的。

本来，有关本业的东西，是无论怎样节衣缩食也应该购买的，试看绿林强盗，怎样不惜钱财以买盒子炮，就可知道。然而文艺界中人，却好像并无此种风气，所以出书真难。

这封信还是鲁迅先生口授由许广平先生笔记的，但信末有鲁迅先生亲笔署名，可见他的健康已比前一个月略有起色了。苏联版画展览会的作品终于能够通过许多人的劳动印成这样一部集

子，鲁迅先生的喜悦之情是很能从这封信里体会得到的。可惜病魔一直没有放松我们的鲁迅先生。七月起他的肺病，时愈时发，须藤医生的连续诊治和注射没有能够挽救这位巨人的生命。十月十九日他就停止了呼吸。

今天，我们已和苏联一样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了。我们也有了集体农庄、工人住宅、托儿所、水闸。我们也能够自己造飞机、汽车、拖拉机了。我国的版画展览会，在日本、印度、缅甸、英国等国家分别的举行。鲁迅先生所奋斗、想望的日子，我们已亲身享受到，但是鲁迅先生离开我们已整整的二十周年。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日

(原载《版画》，1956年8月号)。

赵家璧 (1908—1997)，笔名筱延。江苏松江人。编辑、出版家。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学习时，兼任良友图书公司《中国学生》月刊主编。一九三二年任良友文艺图书编辑。经郑伯奇介绍与鲁迅相识，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鲁迅先后向良友公司提供自译书稿多部；一九三四年他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时，特邀鲁迅编选其中的《小说二集》。这期间，鲁迅也通过他出版过一些青年作者的著译。

记鲁迅先生 与良友公司的几件事

赵家璧

一

我认识鲁迅先生是在一九三二年的夏天，那时我刚从学校毕业出来，在良友图书公司担任文艺书籍的编辑工作。这个由广东商人主办的出版社，一直是专业出版画报的。创造社的老将郑伯奇先生，因为受到反动统治的迫害，改了名字，也在良友主编一本电影画报。当时我们计划出版“良友文学丛书”，进行组稿工作、研究组稿对象时，当然最先想到的是最受人民群众爱戴的进步作家，也自然的联想到鲁迅先生。我最初认为像良友这样一个过去专出画报而与文艺界很少渊源的出版社，很难争取到鲁迅先生的文稿，但是郑伯奇先生鼓励我，认为不妨一试，他说可以尽介绍之责。于是有一天下午，由郑伯奇先生电话约妥后，伴我到内山书店去看他。我们到店时，鲁迅先生早已在内山老板账台前的藤椅上坐着等待我们了，于是一起到另屋去谈话。

没有看到鲁迅先生之前，从许多不了解他和有意中伤他的文人们所造的谣言里，不免把他想象成为一个严厉的、怪僻

的、不易接近的老人。又因为自己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编辑，对这次会谈，心理上先存有戒惧之心。但除了寒暄和述明来意的最初几分钟时间比较紧张之外，我发现我的猜想完全错误了。鲁迅先生听到我们有一个大规模的出书计划，表示非常兴奋，一口答应了我们的要求；而且说手头正好有二十余万字的译稿即可整理就绪。这套丛书的原来计划是准备只收创作的，但是鉴于得到鲁迅先生的文稿不是一件容易事，而丛书初创刊时，就有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定会有好影响，不论是翻译的或创作的。于是我们就谈到译稿的内容篇幅，是否可以分成上下两册；如何另取书名以及交稿的时间和出版条件等等。一切都很顺利的解决了。接着鲁迅先生问：素来不出文艺书的良友公司，怎样忽然想挑这一条路走，而且还找到他去出书？他很幽默的说：“最好你们回去先向良友老板说清楚，出版鲁迅的书，是要准备着有人来找他麻烦的。”但是他最后又说：“现在上海出好书的人家实在不多，良友愿意这样做，我倒是愿意尽力帮助的。”这初次会见的印象使我认识到鲁迅先生是一个非常热情的、和蔼可亲的长者，对青年人寄予无限的同情与希望，对出版事业愿意给以一切的协助。

九月二十日，鲁迅先生已把原稿整理完毕。这本译稿原名《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为了适宜于丛书的篇幅，便分为上下两册，一本名《竖琴》，一本名《一天的工作》。他的原稿都是用毛笔写在中国纸上的，字迹秀丽清楚，折叠得整整齐齐；上下两册都用细麻绳分别扎开，上面用白纸题着书名。我记得那天还是他亲自送到良友来的；两本原稿外面用日本制的花包袱包着；还附了一封信，对排列格式提出了要求。鲁迅先生把原稿自己送到出版社来使我很受感动。我说应当通知我让我去取好了，他谦逊地说：“北四川路这一带我经常走过，并非特地来此，顺便带来，就不用你们跑了。”

此后鲁迅先生也时常到良友来；对良友走上文学出版事业的道路，表示了关怀和鼓励。我们的出版计划，经常请他提意见，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由他介绍到良友来出版，如梵澄的《尼采自传》；周文的《父子之间》；叶紫的《山村一夜》；葛琴的《总退却》等等；而我们有什么事，如找他编选或写序之类，他无不慷慨的答应了。

二

反动统治对进步文化的迫害，当时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方式。一九三四年二月初，更明目张胆地查禁了一四九种进步文艺书籍，在这批书单中，鲁迅先生的著作几乎全部在内。这一无耻勾当的真正目的，还是借此借口，使出版社误认为要避免事后查禁，就只有事前送审之一法。于是一九三四年七月起，臭名昭彰的“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了。记得这个鬼衙门设在上海城内“也是园”。从此上海所有出版社的任何出版物都得送去让这批检查官审阅宰割。删去的地方，不许开天窗；不问通顺与否，一定要把文章接起来；高兴的时光就替你改动几个字，或是加上一句半句话；而认为问题严重时，出版社的编辑还得准备着被召唤去面训一顿。

检查官不但对初版原稿要进行审查，对已经出版的书，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衙门，也可以追溯既往算旧账。鲁迅先生的《竖琴》是一九三三年三月初版的，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份印的第三版，出版社还有几百本存书，检查官同样要出版社去送审，而结果强令把“前记”删去才能出售，理由是文章中讲到了“无产文学”。这种无理取闹的行为，实在对它哭笑不得。当我们把这个情况和建议征求鲁迅先生意见时，先生复信说：

……中央怕《竖琴》前记，真是胆小如鼠。其实并无害，因此在别一面，也并无怎样的益，有无都无关重要，只是以装门面而已，现在剪去以免重印重装；我同意于公司的办法，并无异议也。

三

一九三四年秋，良友公司计划出版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总结五四运动以后第一个十年间的文学创作活动。这套书共十册，分理论、小说、散文、诗、戏剧、资料六部分。小说材料较多，如何分别编辑和找谁编选是一个难题。如按当时的文学团体分，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是大团体，作家较多，可以单独出一册；但其余的文学团体的作品就不能单独出版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编选人比较容易找，但其余的文学团体请谁担任编选最为适当呢？我们当然想到了鲁迅先生，莽原社、未名社、语丝社等团体都是他所参加、主持而熟悉的，他又是创作第一篇成功作品的小说家；但是要他担任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以外其他许多文学团体作家的编选工作，是否能获得同意呢？当我们把大系的出版计划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并且直率地提出了请他担任其他文学团体的编选人时，他犹豫了一会，没有即刻作直接的答复，但对整个出版计划是非常赞同的，认为这样的整理资料工作，对后人的研究参考是有用处的；然后他对编选的事，谦逊的说：“一定有比我更合适的人吧。”当我们坚决要求他担任时，他表示：“假如真找不到别人，就由我来担任也可以。但有一个条件，许多文学团体的刊物如《新潮》、《新青年》、《弥洒》等等，手头都没有，必须由

出版社供给借用。”这一点我们当然欣然答应。临别时，他开玩笑似地说：“你们来找我同意为你们编选这本集子还是一件容易的事，检查官是否同意，你们倒要郑重考虑的！”

十二月二十六日那天，我同时收到了他的两封信，这两封信的寄发日期相差不过半天，但是送达的时期却碰在一起。第一封信中这样说：

《新文学大系》的条件，大体并无异议，惟久病新愈，医生禁止劳作，开年忽然连日看起作品来，能否持久也很难定；又序文能否做至二万字，也难预知，因为我不大会做长文章，意思完了而将文字拉长，更是无聊之至。所以倘使交稿期在不得已时，可以延长，而序文不限字数，可以照字计算稿费，那么，我是可以接受的。

第二封信的内容却和第一封信完全不同，信中说：

早上寄奉一函，想已达览。我曾为《文学》明年第一号作随笔一篇，约六千字，所讲是明末故事，引些古书，其中感慨之词，自不能免。今晚才知道被检查官删去四分之一之三，只存开首一千余字。由此看来，我即使讲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也必不能满他们之意，而我也确不能作使他们满意的文字。

我因此想到《中国新文学大系》。当送检所选小说时，因为不知何人所选，大约是决无问题的，但在送序论去时，便可发生问题。五四时代比明末近，我又不能做四平八稳，“今天天气，哈哈”到一万多字的文章，而且真也和群官的意见不能相同，那时想来就必要发生纠葛。我是不善于照他们的意见，改正文章，或另作一篇的，这时